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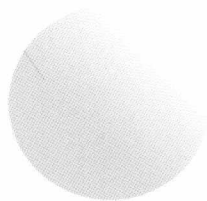
李宗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

李宗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李宗克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ISBN 978-7-208-12735-7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9107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

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

李宗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01,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35-7/C·481

定价 38.00 元

总序

卢汉龙

社会学是一门现代学问,要不断提供新的视野。

1978 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与开放新历史时期的序幕,莅年 3 月,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了关于我国理论工作的汇报以后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个讲话站在一个全局和实用的角度,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为新形势下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就是在这个著名的“补课论”指示下,我国停顿多年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得到了恢复与重建。所以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学正是这样与改革开放同行,记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带来自身学科的建设与成长。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并迅速融入国际社会。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社会发育、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正在成为主宰我国新发展时期里不断递进又相互促进的四大主题。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迫切需要得到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引导,作为通识性的社会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我国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以后首批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这次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编撰这套社会学新视野文丛,正是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提供一个平台,展现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与贡献。

社会学新视野首先就是要捕捉和提供各种来自科学理性对社会的

探讨。“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知识。除了“科学”知识以外，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还包括“常识”、“哲学”和“宗教”。科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相当重要，相当现代。如果将知识的“实证性”（经验性）和“解释力”作为两个维度来建立人类知识体系的话，依次构成就是常识—科学—哲学—宗教四个不同层面的知识体系。在人类全部知识体系中，越是处于低层面的知识，它的经验实证性越强，但解释力则会越低；越是处于知识层面高的知识，它们虽能提供较高的解释力，但是它的实证性则越差，有些甚至无法验证。科学是介于常识和哲学意识形态知识之间的一种知识。它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是把不同的经验常识浓缩提炼为一种解释力更高的简约表达。人类社会越是复杂发达，越是不能满足于分散和个别的经验知识，同时也不能接受表面上是有“解释力”，实际上却没有经验事实可以支撑的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和宗教信仰。

社会学正是一门重视经验研究的科学知识。作为一门普通的社会科学，它脱胎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社会理论（孔德），立足于科学的事实与方法（杜尔汉姆），力求对于人类社会现象作知识性的探究（帕森斯）。所以社会学一直是以科学理性立命，没有科学的精神和经验性方法就没有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的经验和事实也都表明：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区域内，社会学受到重视和发达的程度是和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理性思维水平有关。凡是崇尚科学理性思维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学就容易得到重视和发展，反之亦然。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兴衰历史同样也佐证了这个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1952年我国在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取消了“社会学”，1957年，一大批依然希望用科学理性来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学者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恰恰就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征兆，说明当时我国主流发展思维已经开始脱离科学理性的轨道。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充分说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不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种违反科学理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改革与开放正是我国恢复集体理性的开始，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了理性的常态。我国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来给予回答。科学的理性思维就是不懒惰、不空谈口号，不唯本、唯上，用经验事实来说明问题，研究论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

径。实证科学和经验理性正是社会学为政府、为公众所能提供的各种新视野。

社会学新视野也迫切需要以中国社会为题材来建设和发展社会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对中国的关注。不同的理论兴趣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国的经验中产生不同于已有的理论发现。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则致力于创新,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视野就是希望从中国社会研究中寻求和发现对人类社会更全面、更新颖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离开国际学术之间的对话将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科学本无国界,知识贵在积累,就像数理化知识不会有国别差异一样,中西各国之间的社会文化虽然各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会有差异,但是“人性”是一样的,世道人心的差别其实很小。社会是人性的体现,社会学实际上研究的是世道人心的规律。中国社会学尤其需要体现从“个人”出发来看社会的视野。由于中国文化历来具有“集体本位”的特点,人以“群”(即“社会”—严复)分,个人被规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框架里,从而被淹没。中国社会正式系统(国家和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系统的渗透又无孔不入,从而个人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如同“散沙”。这些往往使人们产生中国人没有“社会”的感叹,学界甚至将它作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根本不同的理由。其实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学更多是从个人主义的视野来看社会,而中国的社会观则是站在社会本位的立场,难免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这种可称之为中国社会的“早熟”现象,更是需要我们呼唤社会学的新视野。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都已显示,个人主义文化正在勃起,现代化发展已经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和地球村已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就是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需要在同样的概念体系和普遍认可的方法来提供创新视野的成果,既为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自我服务,也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知识。

社会学新视野还需要强调多学科之间的交融贯通,合作创新。社会学专注现实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十分庞杂,社会学也曾被人或自嘲为“剩余学科”,意思是社会学自持太高,对象不明确,要“科

学”地研究“社会”其实很难做到，它只能专门去研究别人不研究或没人研究的领域内容。社会学的“剩余性”恰恰正是说明了社会学视野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学博采众长，集成创新。面对后工业社会，新产业革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学研究本身也需要拓展眼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新兴媒体和大数据分析之类的现代技术手段，组成各种三菱镜，看万花筒中的精彩世界。

我相信本丛书的编撰和发行能得到学界的支持，会受到读者公众的欢迎和喜爱。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序

本土化一语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极为复杂的面向。对于“何为本土化”的诠释,以及对于“如何本土化”的期待,学界也有很大的差异。用这本书作出的概括来讲,关于学术本土化的主张至少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其中既有较弱意义上的学科引入应用论、理论验证修正论等观点,也有较强意义上的问题意识本土论、社会文化特殊论、文化学术自主论等主张。

在我看来,后几种类型的本土化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多年前,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这样一个观点在传统的“汉学”或者“中国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反响,表明它的确抓住了整个学术思潮中一种重要的动向。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诠释。它很大程度上是指出了一个方向,但还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明晰的研究框架。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方法,首先应该意味着中国社会研究应该有整体的视角,服务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真问题。其次,更重要的是指中国社会研究还应该从国家自身历史经验和演变脉络中去寻求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而不能完全套用来自西方的某种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

强调以中国为中心,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中国问题合理有效的解释。近代以来,因为百年挫折造成的文化自卑,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问题的发问方式几乎全部表现为“中国哪里不对”、“中国在哪些方面还没达到西方现代社会的状态”,等等。这种发问方式虽然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会遮蔽掉很多问题。我们把所有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自身的文化上面,同时离开对西方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性研究,而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为某种文化的力量。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要知道,西方文化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其内部也存在极大的差异,现代西方文化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强势而被逐渐塑造成似乎

内在一致的东西。正是因为西方强大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就有了自信，进而把这种文化塑造成某种普适的东西。是因为非西方国家被揍怕了，才又承认他们的强大，不得不向他们学习。你要学习，很大程度上就得接受他们的观点。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大量输入、搬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现代汉语学术思维、传媒话语乃至日常讨论恐怕都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了。但这经常会造成两种情况：一方面没有真正理解西方这些理论和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而难以真正把握其语境和语义；另一方面又生硬地套裁中国经验事实，而不能真正把握中国现实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我觉得是一个要非常警惕的事情。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普遍性作为人类理性认识要达到的一种目标，表面上看似总是好的。但普遍性作为一种抽象，会抽离掉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从而在解释具体现实时可能出现巨大错误。社会科学一旦加入历史的维度，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都要重新考量。更重要的是，在当下仍然是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格局下，大国间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在社会科学理论的背后就经常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发挥着不同的政治影响。

所以，学术本土化表层上是研究的方法问题，而在深层次上则往往隐含着价值立场问题。在方法论的层次上，社会研究方法一定离不开价值。社会事实无限杂多，是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以及从何种角度、使用什么概念去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领域，价值的尺度与真理的尺度之间从来密不可分。

今天，在我们寻求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讨论学术本土化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当民族复兴真正来临之际，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提问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们打量自身和世界的眼光都会不一样了，以何为美、以何为善乃至以何为真都会有巨大的变动，我们也会重新思考和定义所谓“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内涵。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运动，可以视作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曹锦清

2014年7月

目录

总序 / 1

序 / 1

第一章 导论 / 1

1.1 本土化: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意义问题 / 3

1.2 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吗? / 7

1.3 文献回顾 / 10

1.4 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 / 13

第二章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论题 / 16

2.1 德国历史主义的启示 / 17

2.2 全球范围内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发展 / 34

第三章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论题的演进 / 43

3.1 观念转型与语言转译:晚清民初的
社会学本土化 / 47

3.2 民国时期三大社会思潮与本土化问题 / 52

3.3 政治考量抑或知识反思:20 世纪 80 年代两岸
社会学本土化运动 / 75

3.4 规范化与本土化:20 世纪 90 年代的讨论 / 81

3.5 方法论抑或价值论:社会学本土化反思的
深入发展 / 85

第四章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论的类型分析 / 94

4.1 学科引入/应用论 / 96

4.2	理论检验/修正论 / 99
4.3	问题意识本土论 / 102
4.4	社会/文化特殊论 / 105
4.5	文化/学术自主论 / 109
4.6	小结:类型化的意义和困境 / 112
第五章	本土化的知识论逻辑：对社会科学普遍性的反思 / 115
5.1	普遍性与特殊性——本土化论题的基本逻辑框架 / 117
5.2	社会科学中反思普遍主义的知识论视角 / 121
5.3	知识论视野下重审本土化论题 / 147
第六章	社会学本土化论题中的方法论议题 / 155
6.1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 / 155
6.2	理论导向与问题导向 / 161
6.3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 / 164
6.4	形式理论与实质理论 / 168
第七章	当下语境中社会学本土化论题之探讨 / 172
7.1	当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论争的基本逻辑 / 174
7.2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路径探讨 / 178
参考文献	/ 187
后记	/ 207

第一章

导论

在中国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都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和引起热议的论题。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不同时期均有关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①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中,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多个时期均有学者提出各种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主张。^②这种本土化的呼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科学如何更加有效地解释中国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复兴和学术自主的诉求。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复兴的自信心不断增强,学术界也开始重新积聚起一股主张学术本土化的情绪和力量。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高涨,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却始终面临文化与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任务凸显。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如何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这些理论任务都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建构。当下,试图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内在困境,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论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要求愈益强烈。在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具有较强人文色彩的学科中,本土化的呼声都在上升,不少学者撰文倡导社会学或社会科

^① 如孙本文、吴文藻等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掀起过一阵本土化讨论的小高潮,而台湾社会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本土化的呼声一直非常高涨。见郑杭生《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叶启政《社会学和本土化》等著。

^② 见参考文献:吴文藻1930;孙本文1932;叶启政2006;郑杭生2000。

学的本土化。^①

但是,无论是关于本土化论题的理论探讨,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实质发展,目前都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本土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朗。对不少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的学者来说,社会科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以经验性的科学方法来探求普遍的规律,于是本土化就成为一个伪问题。而在本土化论的支持者中,也缺乏一致的定义和理论框架,很多阐述停留于一般的议论而非系统的论证上,不同观点常常是横岭侧峰,各得一隅,甚至分属不同话语系统,对话更无以展开。

这一点亦如台湾学界本土化论的主将叶启政所言,“谈到‘本土化’,牵涉的问题真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包含的层面更是多元,任何的阐述都只能解其一二,难以涵盖其全貌。……(这)是一个无法有着让所有人接受并感到会有满意答案的问题”。^②而同在台湾的萧全政教授也指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意义是多重的,“从本土资料的运用、题材的选择、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论性分析、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修正、知识体系的建立、建构具特色的论述体系,到确立‘主体性’或‘学术实践的主体性’,而在全球层次‘掀起范型的革命’等,当然都属本土化的范围,甚至低俗如强调要以本国语言、本国园地发表研究成果的,亦很难说不是本土化的一部分。”^③

围绕本土化论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之间或者针对的问题不一致,或者论证的逻辑有所不同。譬如,有些学者主要是从客观解释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西方传来的主流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现实,需要构建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有些学者则更多从“价值关联”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中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不同,以及西方理论和概念必然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建构着西方的“话语霸权”,进而提出要实现中国的“文化自觉”以及社会学的

① 相关论述见于多个相关学科,如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贺雪峰:《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见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见公羊:《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②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③ 萧全政:《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意义与理论基础》,《政治科学论丛》2000年,总第13期。

“理论自觉”等问题。

这样,“本土化”一词就成为一个高度含糊的概念,有关的学术主张也显得颇为多样和复杂,学界对“本土化”主张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可以认为,在有关的讨论中,学界关于“何为本土化”这样的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清晰共识。这就导致围绕本土化论题的其他一些问题,如“为何本土化”以及“何以本土化”等,也都难有明确答案。也由于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有关本土化的讨论虽然屡屡提起,却很难形成更有效的学术积累和进步。

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我们就需要对本土化论题进行更为系统的反思。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还需要首先区分两方面不同类型的研究:本土化的社会研究和本土化论。前者是指被认为具有本土化特质和理论贡献的实质性社会研究,包括形成的具体概念和理论体系;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在社会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本土化主张与对这些主张的元理论反思,它们直接回答本土化“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等基础性问题。而在通常有关本土化的讨论中,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往往被混为一谈,从而更加造成理论对话中的混乱。

就本书而言,后者构成了研究的重点。本书主要围绕不同时期、不同论者提出的“本土化主张”,识别不同的观点类型,剖析其背后的元理论逻辑,把握真正的分歧所在,从而试图结束有关讨论中的语义模糊。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讨论本土化的路径和出路问题。

1.1 本土化: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意义问题

要清楚地界定“本土化”的概念并不容易。从语言学角度讲,词语语义和语用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语言的固有特征,社会科学的概念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一困境。这种概念问题的繁难甚至让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心生抵触,他公开地告诫:“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①当

①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代科学哲学家普特南也曾悲观地宣称：“大多数术语都是不可能被定义的——或者至少，如果定义是指永久地固定某种绝对把握术语意义的东西，那么术语是不可能被定义的”。^①所以，探讨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概念的含义，以及相关主张的类型，必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土化”这一概念，就如同“公正”、“公平”、“自由”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抽象范畴一样，在不同的主体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是，我们终究无法完全避免去思考语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仍然需要处理那些在不断涌现或者变异的概念，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诠释，即使这样一个“诠释”是不断演变而难以完全确定的。上述波普尔所讲的“事实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仍然需要语言和概念去呈现。试图把人类语言全部简化为逻辑符号一样的东西，从而形成一套统一的、永不再引起纷争和固定封闭的形式化科学语言体系，即使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彻底实现。

从逻辑的角度看，社会科学本土化议题讨论的不是一个实证命题，而主要是一个规范命题，牵涉到对于何为“好的研究”的应然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价值判断的对象同样不是可观察的物质对象或者外在社会事实，而是以精神文化形态存在的科学知识，这就决定了有关本土化的讨论必然会存在诸多的分歧。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围绕学术本土化（或中国化）长期以来都是聚讼不已。而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社会学又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学科定位历来存在模糊，在普遍化方法和具体叙事方法之间摇摆不定，关于本土化问题的观点分歧显得更为突出。^②在不同时空、不同学者那里，用本土化这样一个标签所表达的含义往往并不一致，甚至有极大的差异。这些同名的主张，在其思想缘起、理论目标和哲学预设等各个层面，都有或显或隐的分别。

对许多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的学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社会科学，通常反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提法。虽然持此种观点者或

① [美]Putnam, H., 1988,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The MIT Press, p.9.

② 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特殊性，可见杰罗姆·凯根：《三种文化：21 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世纪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89 页；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10 页。

者出于不屑,或者出于避讳,很少撰文正面讨论本土化问题,但是这种观点的广泛存在还是为学界所公认。正如叶启政教授所言,一个积习很久的观念就是:“认为科学的知识必然是具普遍性,乃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实无有如中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俄国社会学或者日本社会学等类似的划分,更难以有‘本土化’的可能和必要。”^①

相反,不少人文主义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拒绝承认“普遍法则”在社会科学中拥有最高地位。他们强调某种“情境化的”、“意向性的”、“价值论的”解释逻辑,这些解释逻辑均与科学普遍性所要求的“客观性”形成对立,所以对他们来说本土化几乎成了社会研究的必然选择。

不过,即使在赞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者中,不同论者往往引入不同的理论资源,还缺乏清晰一致的范畴和分析框架。从学术史来看,“本土化”的主张是不同学者、不同时期多种复杂情绪的反应,这些情绪大多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涉及不同的情感层面和认知维度。虽然有一些人对本土化论述的哲学基础进行了严肃的反思,试图为本土化主张奠定更为稳固的知识论基础,^②但大量论述还未能充分呈现背后的深层知识论和方法论逻辑。如叶启政所言:“所谈的一切都还停留在认知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认定的层面上面。……整个形象既朦胧又暧昧,容貌还是难以确认,更罔论为整个社会科学界带出清晰而有力的基本取径,开展崭新的学风。”^③这样,相关研究和论述便呈现出非常复杂不清的面貌,“本土化”一词也成为高度含糊、充满歧义的概念,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民族情绪的表达和学术场域的权力争夺。^④

①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② 何秀煌:《从方法论的观点看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见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第1—29页;高承恕:《社会科学“中国化”之可能性及其意义》,见《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31—50页;叶启政:《对社会学一些预设的反省:本土化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学刊》(台北),1987年第11期,转引自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③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④ 强世功:《想起来黄宗智——本土化与法学传统》,《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

事实上,与“学术本土化”有相近诉求的学术批判运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学术界内部往往同样存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毫无争议的“科学”。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史上,各种学术不满曾经激发了多次的“方法论之争”。^①这些争论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实质性的理论和学派观点之争,也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之争。譬如在社会理论方面就有功能论与冲突论、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等不同理论取向间的分歧,在研究方法方面则有定性与定量、解释与诠释、实证与人文、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等争论。而在非西方国家学术界,类似的学术争论往往会通过对民族或者国家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强调,表现为学术的“本土化”运动。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主张呢?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仅仅是一种含糊的指向,还是有着某种明确的方法论要求?该如何界定、理解本土化的内涵、要求或者标准呢?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仅仅指“将源自西方的社会理论与方法,有效地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②还是像杨国枢所提倡的探求西方理论的“本土契合性”,抑或郑杭生所呼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抑或如叶启政教授所言的反思西方现代性,提出体现本土价值的解放性学说?这些不同的知识主张何以成立,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知识论,或者本体论预设?

在笔者看来,围绕社会科学本土化论题,思想的多样性远远超过了同一性。在“本土化运动”的名目之下,既有自我声张的有关本土化立场的论说,也有自己虽未声张但被学界认为有“本土化”特质的实质性社会研究成果。在那些本土化立场的论说中,研究者也往往具有不同的现实目的,或者其观点奠基于不同的哲学预设和理论资源。而在那些未曾明言“本土化”却被视为“本土化研究”的作品中,我们往往又不太容易辨识其在知识论或者方法论上深层次的基础预设。因此,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本土化运动”,具有某种清晰的逻辑和系统的理论观点。

所以,在本土化主张屡屡兴起,而其中模糊与分歧又历久不息的情

① 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之争最为著名的当属 19 世纪晚期的“历史主义之争”和 20 世纪中期的“实证主义之争”。

② 阎明:《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7 页。